

父子三将军传奇

□凌辉

在平江县长寿镇邵阳黎家洞湖上村,从耄耋老人到少年儿童,无不口口相传着他们村里的荣光——苍岩洞方正家出了父子三将军。父亲方正(1914—1997)少将,济南军区原副政委。参加过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是抢渡大渡河争夺泸定桥的先锋,抗日战斗的模范,中原突围的勇士,淮海战役的英雄,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大儿子方南江,少将,曾任大军区组织部部长,省武警总队政治委员,武警部队政治部副主任。三儿子方凌江,少将,曾任济南军区联勤部部长。2008年7月被授予少将军衔。

儿子眼中的父亲

方正将军的大儿子方南江,少将,武警部队政治部原副主任、著名军旅作家。他在《方正人生》一文中说:“父亲原名方应生,后改名为方正。后来我们通过对父亲一生坎坷经历的了解,才渐渐明白,父亲改名的意思是:做人要堂堂正正,做事要光明磊落。”方正将军对子女要求严格,按规定办事。“子女前程首要是当兵,这反映了父亲的军营情结。二弟湘江另有主见,20世纪80年代初自报转业,把父亲气得半死。到了我的两个小妹妹苏苏和伟伟要当兵的时候,大气候变了,自行当兵被批为‘走后门’,父亲就不让她俩当兵了。尽管同龄的女孩子‘走后门’的也不少,但对这两个小女儿却另眼相看,就是不点头。后来,苏苏被安排到山东化工厂,伟伟被分配到省电影机械厂,都是工人。苏苏曾要求调整工作,父亲拿出了共产党员的行为标准要她学习。伟伟长期没有

入党,父亲同她谈过多次,直到在北京病危时还劝她加入党组织。伟伟回来终于向党组织表达了入党的意愿。”

传承红色基因

方南江的童年是在苦难中度过的。从呱呱坠地起,就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熔炉里经受磨炼。幼年时就跟随父亲方正母亲章棣所在新四军五师和十三旅机关辗转,1946年6月在形势极其险恶的中原突围时,他被疏散到河南乡下,在农民家中度过异常艰难的岁月。直至1949年才被接回军营。

方南江少将在2003年退休后,刚刚放下繁忙的警务,就一头扎进长篇小说创作之中。他悄悄坐在鲁迅文学院作家班的最后一排,作为旁听生听每一位老师讲课,为创作长篇小说做准备。他用7个月时间,夜以继日地潜心创作,将他从1963年8月参军以来,特别是1996年调武警部队后,数十年的军旅生活积累和深沉思考,运用早已娴熟的艺术功力,创作了长达36万字的长篇小说《中国近卫军》。这是一部艺术地再现中国武警部队发展建设历程的精品力作。作品在《中国作家》《长篇小说选刊》上刊发后,国内多家大型期刊几乎都同时转载了这部小说。被列入2007年度全国推荐的读书书目中唯一的军牌图书。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三儿子方凌江以科技强军。他出生于和平时代(1956年6月),在外人看来,他作为一位解放军高级将领的“三公子”,是在蜜罐子里长大的。但事实不是那样,他兄妹多(五人),一家八口,父亲又特别“抠门”,对儿女们要求特别严格,母亲也从娇惯他们,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粗布衣裳,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一个接着穿哥哥穿过打了补丁的旧衣服。父亲特别看重的是从小就培养孩子们有一个吃苦耐劳发奋读书的好习惯。哥哥南江就做得特别棒,成了妹妹学习



根据方南江同名小说《中国近卫军》改编的电视剧剧照

的榜样。弟弟凌江聪明好学,从小对自然科学很感兴趣,刻苦钻研,立志当个工程师。经过不懈努力,如愿以偿,他当上了济南军区联勤部指挥自动化站站长兼高级工程师、济南军区联勤部部长。2008年7月被授予少将军衔。他发扬父辈的长征精神,坚持科技强军,深入调查研究,为适应后勤指挥自动化需要,研究撰写和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取得了不少非常适用的科技成果。2008年7月被授予少将军衔。

激励故乡自力更生

将军的家乡长寿镇坳上村,因为地处偏僻,多年来迟迟发展不起来。对此方正老将军非常着急。他趁回乡探望母亲的机会,走村入户和乡亲们共商自力更生脱贫致富的办法,建议开发荒山,育树造林。他把自己节衣缩食省下的积蓄拿出一半给乡亲们发展生产。他写信给长寿区委书记朱胜斌,请帮助贫困山村“鼓足干劲,大力发展生产。”并为家乡争取到军区支援贫困地区的一台汽车。他叮嘱儿女们不要忘记乡亲们常回乡看看,帮助解决一些能解决的实际情况。在方正将军的激励下,坳上村的乡亲们

积极行动起来。

“一定要传承将军们敢拼敢闯的精神,让村子变个样!”1983年,时任村支书刘楚沉决定带领大家找条致富路,将目光瞄准了村里的1.8万亩荒山。他向镇里打了设立坳上林场的报告,得到批准后,他开始筹钱买树苗。刘楚沉和一带党员干部带头,你50元、我100元地凑起来。村民们也纷纷解囊,有钱出钱,没钱出地。村里又向镇信用社贷款10万元,陆续买回了几十万株杉木树苗,将1.8万亩荒山装点成了绿色。

2005年,坳上林场开始伐木销售,至2009年第一轮采伐结束时,林场累积收入2000万元。老支书刘楚沉也早已退休,李壮雄接过服务村民的接力棒。有人劝李壮雄:“你们几个干部为了林场累死累活20多年,好歹给自己多留一点。”他却摇摇头:“当年老支书建林场的目的,就是为了带着大家挣钱。如今林场赚了钱,就得把钱都分给乡亲们。”

昔日贫穷的山谷竟完成了华丽转身,一跃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典范。如今,这个“绿色银行”进一步发展壮大,坳上林场成立了林业专业合作社,村民通过土地、资金、技术、劳动力等形式“入股”,既拿工资、又享“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

“解元试卷”回归岳阳

□文/图 本报记者 黄梅

岳阳南湖边的尚书山公园,取名得益于尚书山五里之内安葬了明朝生于岳阳的三位尚书,即户部尚书方铤、嘉靖刑部尚书颜颐寿、工部尚书谢登之。

谢登之,字汝学,曾与明朝首辅张居正同乡,举第一,后于嘉靖丁未(1547年)成进士,累官至工部尚书。为官期间,他秉公办事,不阿附权贵,不谄议别人,一生清正廉洁,为后人所敬佩和爱戴。

近日,岳阳文史爱好者陈晖昆致电记者称,前不久他从孔夫子旧书网上意外发现有“嘉靖十九年(1540)”的《湖广乡试录》复印件出售,花200多元购得一册,仔细一翻,竟然全面详实地记载了谢登之当年乡试的情况。

“外籍考官”评卷和排名

科举时,乡试第一名称“解元”。陈晖昆从这本乡试录中得知,全省有2700多人参加,农历八月份三场在省城武昌举行,以三科成绩汇总后综合排名,共取“中式举人九十名”。第一场为《四书》,分别有《易》《书》《诗》《春秋》《礼记》;第二场为《论》;第三场为《策》。三场考试中,第一场、第三场,谢登之都为第一,第二场为第二名。三场叠加,占两个第一,故录为本次乡试第一名。

还令陈晖昆颇感兴趣的是,在480年前,当时的乡试也如同当今考试一样,为了体现考试的公平公正性,由“外籍考官”来担任评卷和排名的工作。

工作人员中,前五名总览全局的均为湖广省当局政要。负责考场的两名主考和七名副主考,都是从湖广以外的地方聘请,分别称为“考试官、同考试官”,全权负责阅卷。

试卷从右往左排,竖写,第一行是题目,二行是作者名字,三行开始是评卷人和评语,然后才是正文。如,第一场《四书》卷有四名考官对谢登之试卷进行了评论,作品题为《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科目第一阅卷人,是江西临江府儒学教授陈建,他批语为“是篇,作者多失夫子语意纯正平达黜浮崇雅。此足录矣!”另三名考官杨应和、谷宇龄、黄大廉各有点评,一致认可遂列为科目第一。

陈晖昆认为,谢登之当年能够从二千余人中脱颖而出,肯定是文章的观点获得了考官的高度认同。在《策·第一问》中,作者有“君臣相与之际,其心贵相知,其道贵相成也。”这一观点,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人之相交,贵在相知与相诚,与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和谐、友善、诚信,是同一个意思。

填补“解元文化”的不足

“科举考卷,是文化、文史原始素材的一种,是研究科考和文明进程的第一手原材料。谢登之‘解元试卷’的面世,虽然不是本人手稿,是誉录后的印刷体,但是内容真实的‘答卷’,填补了岳阳文史‘解元文化’的不足。”陈晖昆感慨说。

对陈晖昆而言,这本《湖广乡试录》看似得来容易,其实先期还是颇费周折的。他少年时读《陈氏族谱》,发现书中有关于谢登之的零星记录。谢登之与陈家的陈大为是同榜举人,互称“年生”。陈大为又名陈雨屏,当时是第12名。1540年10月,谢登之、张居正一行,在中举后回到巴陵县十八都饶溪村的陈大为家,留有“才子偕游寿星

堂”故事。那一榜乡试,俗称“谢登之榜”,是以第一名的名字来命名榜名。考试揭晓后,主考方铤编有《嘉靖十九年湖广乡试录》一书,记载90个中式人名字与所读学校,还有考试工作人员和每科第一到三名的试卷。这册书在岳阳几近失传,寿星堂所珍藏的,已经是“残篇断牍”了,在档案馆也没有找到收藏记录。

前些年,陈晖昆编《公田镇志》,发现了有书籍记述谢登之是公田人,可他经过多次的走访、翻阅,一直没有找这名公田文士的证据。看来,地方志书上的这一篇文物传记可能有误,不可全信。意识到这一点后,陈晖昆放开了眼界并一直留意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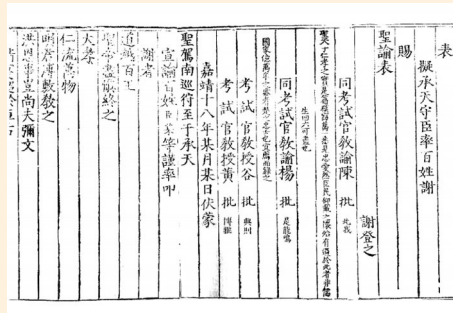
经过仔细比对,他发现这本《湖广乡试录》与陈家祖传残篇相吻合,认定是真本和全本。他打算复印几册,并将试卷初步加注标点以便阅读,装订后还会送有关人士和档案馆留存。

生平得以重新考证

陈晖昆在翻阅史料的过程中,对谢登之的生平进行了考证。《岳阳市志·人物卷·谢登之传》记载,“不到40岁病故于任”;康熙二十四年(1685)《岳州府志·人物卷·谢登之传》和《科举志》都叙明,“年十九,应庚子乡试”;又有康熙《岳州府志》载,“尚书谢登之墓,在城南金鹗山,万历四年(1576)赐祭葬”。《谢氏族谱》对其出生,记为“辛卯、辛卯、辛卯、辛卯”;成文于嘉靖四十四年(1566)的《明永平府通判雨屏陈君墓志铭》,是一篇出土墓志,标题由谢登之手书,其时他的身份是“赐进士第、钦差巡抚、南直隶右



重新装订的解元卷



解元卷的部分内容

副都御史”。综合资料分析,谢登之是1521年,出生在巴陵县第一都兴堤保太东村,即今岳阳楼区郭镇乡枣树村黄陂源谢姓屋场,这样正好符合“年十九,应庚子乡试”的历史事件。1521年是农历辛巳年,而非辛卯,故其出生日期应是辛巳年四月的辛巳日、巳时。以万历四年作为去世时间,计其年应为55岁。



握指成拳的力量

——记全省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洞庭围农业社的建立

大江大湖畔,沃野良田千亩。怎样把资源变成优势,有这样一个故事不可忘记。

1953年经整修洞庭湖后,复员军人罗德保所在的王家乡洞庭围地区,由十年九不收的荒洲变成一片绿洲,一部分农民迁居这里开荒耕种,罗德保带头办起了全乡第一个互助组。接着,这里的127户(469人)农民也组织起来办起18个互助组,开垦了500多亩田,通过一年的努力,获得好收成,初步显示了农民组织起来互助合作的优越性。

1953年11月,副省长谭余保和湘潭地委书记胡继宗,到该地的围粮围考察,听取区委书记对互助组情况的介绍后,当即提出试办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12月,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发出后,地委和湘阴县委联合组织工作组,由郑瑞林任组长,张胜斌任副组长,在地委直属机关党委书记陈秉芝带领下,到达围粮围,引导农民办社。1954年1月,区委召开关于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大会,明确办社方针政策及具体做法。

与围粮围毗连的乔山围农民,有6个互助组,他们派代表到围粮围向工作组提出办社要求,后经县委同意,地委批准,围粮围与乔山围合办成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讨论耕牛、农具入股问题时,多数人认为这里的荒洲是国家的土地,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发出来的,不应搞土地报酬;耕牛、农具大多是政府贷款买的,也不存在折价入股;既然大家都要求办社,索性把步子跨大点,越过初级社,办个高级社。经地委、省委批准,1954年2月24日全省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此诞生,命名为湘阴县洞庭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116户,418人,有水田1352亩,旱土171亩。为加强领导,分为两个分社,围粮围为第一分社,社长饶富林;乔山围为第二分社,社长陈良长。罗德保当选为总社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召开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洞庭围农业社章程》。

1954年底,这个农业社扩至127户,469人,有水田1400亩,旱土171亩。洞庭围农业社取消土地报酬与股金分红,推行定额记工,按劳计酬的办法。当年虽遭受百年不遇的洪水灾害,农业社仍坚持统一生产自救,顺利度过灾荒。1955年,洞庭围农业社由于战胜旱、水灾,采用优良品种,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夺得农业大丰收。水稻亩产4295公斤,比单干户高1275公斤,比初级社高75公斤,全社粮食产量67.5万公斤,交爱国余粮35万公斤。洞庭围农业社的事迹被省、中央各级报刊以头版报道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专程到洞庭围拍摄丰产纪录片,在全国宣传。

1955年,省委决定帮助湘阴县湖区建立一个大型机械排灌站,站址选在洞庭围农业社附近的湘江河畔。区委召开附近农业社社长联席会议,研究解决有关牵涉各方利益的具体问题。经反复商议,大家认为只有扩社,许多矛盾方可解决。经县委批准王家乡洞庭围、和平、黄金、新堤、南庄、伏家山6个农业社和荷塘乡的红菱社并入洞庭围农业社,社员增至807户,3269人,耕地面积7434亩。1956年4月,洞庭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被评为全国农业先进集体单位,罗德保荣获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称号,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大会。大会授予洞庭围高级农业社全国先进集体锦旗一面,授予罗德保金质奖章一枚,并当选为党的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北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登上天安门参加国庆典礼。

本报记者 欧梁